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文件

(1987年6月25日至26日)

新 华 社 参 编 部

(1987年7月10日)

说 明

苏共中央1987年6月25日至26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任务的报告。全会批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并决定于1988年6月28日举行苏共第十九次全联盟代表会议。全会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在苏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作了一些人事调整。

六月中央全会结束后，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现阶段国民经济管理改革的报告。

为便于读者研究，特将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文件汇编成册。雷日科夫的报告作为附录，也一并收入。

本文集是根据苏联《真理报》翻译的。

目 录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任务的报告

(1987年6月25日) (1)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闭幕词

(1987年6月26日) (48)

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

(1987年6月26日通过) (52)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任务的决定

(1987年6月26日通过) (71)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召开第十九次全联盟党代表会议的决定

(1987年6月26日通过) (73)

苏共中央全会新闻公报

(1987年6月25日至26日) (74)

※

※

※

附录:

雷日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现阶段 国民经济管理改革的报告

(1987年6月29日) (77)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 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任务的报告

(1987年6月25日)

同志们：

我们是在党的生活和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事件的前夕举行这次全体会议的。数月后，我国将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

伟大十月革命向世界宣告了一个新的工农国家的诞生，确立了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人道原则，提高了劳动者的地位，为群众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开辟了天地。所有这一切使我们能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顺利解决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形成正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族人民的伟大的多民族联盟。

各代苏联人都对发展、加强和保卫伟大十月革命的成果作出了贡献。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在现阶段，苏联人民和党遵循列宁的学说，创造性地发展这一学说，通过改革和更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来继续革命事业。

今天我们将讨论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这指的是根本改革经济管理，指的也是经营机制体制中的质变，即为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辟新的可能性的变化。

政治局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有必要把对改革进程和对苏共二十大决议执行情况的评价提交给中央委员会讨论。

一、沿着四月全会的道路进行改革的某些政治结果

同志们！四月全会后的时期，是我党历史上和我国人民生活中最关键的和政治内容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其特点是，进行积极的理论和实践工作，探索并解决苏联社会遇到的新问题。

可以有把握地说，两年来，我国的政治形势有了本质性变化。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是社会发展中日益增多的矛盾引起了改革的必要性，这些矛盾日积月累，又得不到及时解决，实质上已具有面临危机前的形式。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党制定了改革方针。我们开始前进。革新的过程具有越来越具体的形式，包含越来越广泛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新的领域。

社会中的改革在深化和加强。改革的目标首先是解决构成障碍机制主要环节的矛盾，从而使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加速力。

应当清楚地懂得，我们认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是克服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中出现落后和变形现象。由历史必然性及由变化了的、而且是根本变化了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决定的这些目的，也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社会达到一个崭新状态。

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很多时间来解决这一任务。正是根据改革的进程和结果来判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来判断它实际上给人带来了什么，从社会角度看社会的效率如何。

同志们，正是这一点决定着正在实现的事业的规模和我们责任的大小。

一月全会后社会中发生的变化特别清楚地表明，我国的健康力量和劳动人民都坚决主张改革，主张加速，主张及时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主张无条件地克服停滞和保守思想。

在我国，各个方面生活的民主化过程正在广泛展开和深化。社会组织的行动更加主动。生产管理中的民主原则在加强。舆论的呼声更加明确和有分量。宣传工具开始更积极的有利于改革的宣传。对官僚主义发起攻击，行政命令和强制式的管理方法逐渐得到克服。干部工作发生重大变化，正在靠增加新生力量更新干部队伍。

民主化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它为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整个社会开辟良好的前景。

今天迸发出的精神力量也是改革的成就。公众对科学、文化和艺术界发生的情况，对报刊、广播和电视台的文章与节目的兴趣增加了。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更加敏感而密切地注意社会和国家事务，注意世界观和道德美学问题。

我们进行高等和中等教育改革，这就是在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切都为进一步展开和加深改革提供了新的潜力。

如果谈到对经济中发生的过程作出政治评价，那我要把人们对劳动、对完成自己生产义务的态度上的变化放在首位。决定这一点的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者用行动支持改革路线，支持加速社会经济发展。这是其一。

其二，这是由于许多经济部门改行新的经营方法，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和自筹资金，同时发展先进的劳动组织形式，首先是集体承包制。

新的形势在决定性程度上也影响了经济结果。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了。最近两年来在工业和建筑业，它超过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平均年度指标30%，在农业中则超过1倍，在铁路运输业中超过2倍。在1985至1986年，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4%，而农业为3%。在基本建设这样一个重要的和处于困境的部门也表现出积极的趋势。其他一些经济部门虽然不是没有困难和斗争，但是也在起积极的变化。

已挖掘出了加强社会领域物质基础的更多的可能性。为此目的已拨出超过规定的五年计划拨款近400亿卢布。今年用来发展社会领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

同志们，看来你们会同意这样一点：需要对中央一月全会后这段时期作出特殊的分析和政治评价。首先指出哪一点为重要呢？

可以说，开辟了改革的新阶段，解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和一切领域的具体任务的阶段。

一月全会大大推动了劳动积极性和社会积极性。已看得很清楚，谁也不能置身于改革之外——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立场。这几个月苏联人特别尖锐地感到所积累的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真正根本变革的必要性，贯彻执行革新方针的必要性。同时，在党内和社会上深入理解到，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过程。

社会上的革命改造把要求革新、创造、建设性的首创精神同保守主义、惰性、私利之间的矛盾推到了前列。这种现实矛盾的表现之一就是，群众日益增长的积极性同各个领域中还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同阻挠改革的企图之间的不协调。要克服这一矛盾，就要求在干部政策方面和在确立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新态度和新准则方面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

政治局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最有效手段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而且很明确，这就是广泛发扬民主。今天现实生活也再次证明：正是行政命令的管理社会的形式在阻挠我们前进。民主形式，也只有民主形式才能大大加速我们前进。

改革的经验，它的初步阶段的经验也促使我们去正视各类居民、各个集体、主管部门和组织的实际存在的利益上的矛盾。当然，社会主义消灭了利益的对抗性。这一提法是众所周知的和正确的，但这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消灭利益的对抗性同利益的一致和划一是一回事。

就拿对改革的态度来说，总的说来，大家都明白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生活和工作了，都明白改革、深刻改造的客观必要性。但是，当改革急转直下地转入行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涉及到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时的、狭隘的利益，甚至某些人的自私动机同全社会的利益，同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就浮到表面上来了。

我们清楚地看到，党、苏维埃、经济机关中的改革进行得是多么困难。难道没有感觉到，某些中央主管部门接受这种改革是多么痛苦吗？国家验收制、同酗酒和酒癖作斗争、努力整顿秩序和纪律的经验都说明了改革的复杂性。在实行经济核算原则和确立使劳动报酬同最终成果完全挂钩的劳动报酬原则方面采取的最初步骤就证明了这一点。同志们，这一切都是实际情况，都是活生生的矛盾。我们应该看到和考虑到这些。

社会不能受自私的利益和行动的摆布。应该同这些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工人阶级、劳动集体、特别是已实行国家验收制的那些企业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应有的榜样。大家知道，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它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利益。然而工人阶级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国家验收制是一件必要的事，整个社会、全体人民、每一个人都需要它。

工人阶级正在革新的道路上大胆地迈进。我要说，各行各业的工人阶级是改革的先锋。这对改革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各劳动集体主动地着手解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把及时地优质地完成提供产品的合同义务放在首位。全国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纪念伟大十月革命70周年的竞赛。一句话，工人阶级在为改革进行高度紧张的努力。

在工人阶级坚持真正的公民立场的背景下，那些图私利而干扰社会改造，给改革挡路的人的行为显得特别卑劣。我认为，劳动集体、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应对这样的人表现出强硬态度，毫不妥协。这是生活的需要。我们中央政治局也是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在改革条件下，以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的问题。探索它们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极为现实的任务。这里指的是要考虑个人、集体、各阶级、大小民族、社会集团和

职业类别的全盘利益，它们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以便保证社会能够得到迅猛发展。

还应该利用新的经营机制，利用民主制度，利用政策、意识形态和文化来培养和引导各种利益。改革的意义归根结底在于考虑各种利益，影响各种利益，利用利益并通过利益实施管理。

还应当谈谈我们在开始转向完全的经济核算、转向按最终成果付酬，转向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时碰到的劳动和分配关系领域的矛盾。在这方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呢？问题在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成为被简单化地理解的平等的牺牲品。目前，对这些问题正在进行积极的讨论，不仅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道德和伦理方面。

平等并不是平均主义，这一点似乎很明白。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平均主义的倾向顽固地为自己开路。它产生依赖心理，对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产生不良影响，减弱了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

应该再三地强调，只有利用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的手段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

我们为我国对人提供的高度社会保障而感到自豪。正是这一点使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成为劳动人民的并且为劳动人民谋利的制度。但是，劳动，也只有劳动应该成为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物质和道德地位的基础。人的创造性的和高效率的劳动、才能、对共同事业所作的实际贡献应当受到大力鼓励，相反，消极、无所事事、低水平的劳动素养、违反社会利益的现象，应该以相应的社会和经济形式受到评价。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的内容。

同志们，我只涉及到那些最明显地反映出正在发生的现象的矛盾性的各种问题的一部分。崭新的规模庞大的任务要求我们经常注意对改革进程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对这一复杂的社会过程的矛盾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迫切需要在理论战线上有一个原则性的突破，这种突破应建立在严格分析社会生活现象的总和、对我们运动的目标和前景提出科学论据的基础上。用试错法是不能顺利前进的。社会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政治领导的艺术就是要善于发现和有效地解决矛盾，而不是掩盖和积累矛盾，并且要把它变成进步和自我发展的源泉。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仍是我们在理论上的勇敢精神，向未

来的深刻突破的令人鼓舞的榜样。巴黎公社的经验使马克思有可能研究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道路问题。根据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改造头几年的经验，列宁发展并丰富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当前应当深刻思考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我国和兄弟国家积累的各种各样形式的极为丰富的经验。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展开，我们也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据以制定和贯彻自己的政策。但主要的工作还在前面。

同志们，总的来说，尽管有种种复杂情况、困难和障碍，但是今天在全会上我们完全有根据可以说，改革取得了思想上和道义上的胜利。它已经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但是，在作出这种重要的评价时，我们不应有夸张，更不能高枕无忧。实际上，我们现在只处于改革的第一浪潮上。这一浪潮冲激了一潭死水。

党激励了群众的积极性。而我们的职责是，不允许扑灭热情，而是激发热情，使之充分表现出来。之所以尤其有必要谈这一点，是因为劳动人民对改革的命运尚有担心。人们继续在劝告我们，我要说，是要求我们不要停止，要沿着变革的道路前进。不久前，在视察拜科努尔时，在同列宁斯克市劳动人民的一次交谈中，有人问我：他们那里什么时候也进行改革呢？我回答，共和国和州的领导人都在这里，他们听到我们的谈话，让他们想一想，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为自己汲取相应的教训。

再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以及中央各报刊、广播电视台编辑部收到的来信为例。信中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写道，他们赞成改革，但是，看不到自己周围有什么变化。改革没有触及到劳动集体，没有触及到他们所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和乡村。许多人还用事实令人信服地证实这一点。这就是说，尽管作出重大努力，许多地方实际上还没有进行改革。同志们，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苗头。政治局不能无视这一局面。在筹备这次全会时曾多次讨论过这一局面。

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改革是由党提议而开始的，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使全国行动起来，用自己的思想吸引了千百万人们，产生了巨大希望。如果今天劳动人民对改革进程缓慢感到不安，那就是说，我们工作不力。

同志们，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一些党组织落后于社会上

正在广泛展开的主导情绪和蓬勃发展的进程，事实也说明了这点。显然，这个问题需要在我们全会上讨论。今天，这是工作中的关键因素。党怎样行动，改革也就会怎样进行。

两年前我们要求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领导干部安排好有效的工作，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懂得新的任务，但是要给我们时间来估计形势，理解和掌握新的方法和形式，并把它们用于实践。

政治局对此是理解的。我们当时曾说：每个人都应有时间，有机会去进行改革。但是，同志们，时不我待。不能让党内的改革落后于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和精神进程，不能让人们生活和心情中的变化超越于党内，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对这些进程的理解。

劳动人民写得对：要改革的人已经干起来并已投身于这一工作。而不理解新任务的人，则抓住旧东西不放，以自己的无所作为实际阻挠改革。

因此，政治局具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提高共产党员，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领导人对工作状况、对实际解决业已成熟问题、对改革进程所负的责任。

对各级都应当提高要求。但是，要从自己，从政治局、书记处、政府、中央委员开始做起。

在社会发展的当前转折阶段，中央政治局负有重大责任。当然，对政治局工作作出评价，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我想向你们保证，政治局对于它在解决新的复杂任务方面对中央、对党和人民所负的责任是有深刻理解的。在短短的时期内，在社会改造的各个方面开展了大规模工作。

我可以指出，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对改革和对内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使我们能够作出时代所要求的决定，并有信心地付诸实施。我认为，这点始终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发展的转折时期更是如此。

我应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声明我们也看到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弱点。有一些事实说明，关于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的一些重要决定实施得缓慢，没有得到全面实施。对此，政治局曾作了原则性的和坦率的议论。现在，我们已建立制度，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定期地以督监方式研究中央四月全会和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后所通过的各项重大决

议的执行情况。

在改革条件下，苏联部长会议正在从积极立场出发采取行动。然而，它应当进一步完善自己在管理经济、实现社会政策任务方面的工作，并把对发展远景的关心同解决当前任务结合起来。中央各主管部门的改革比生活所要求的进行得缓慢。

我们知道，离开了地方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以及全体领导干部的积极工作，我们要实现改造是不可能的。他们对切实解决改革的具体问题负有重大责任。我们今天作为积极现象指出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组织的工作有关。

我认为，说地方上的改革也只是刚刚展开，况且并非到处一样，你们是会同意的。有的地方还保留着怠惰、缺乏主动精神的“保护区”。这也都是实际情况，对这些情况，我们没有权利视而不见，更没有权利不关注和不作出党的评价。

现阶段改革的首要任务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批判性地看待情况，客观地分析改革的成就和不足之处。总而言之，需要进行原则性的和同志式的坦率讨论，需要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建设性的主张。

让我们从如何发展国民经济说起吧。政治局事先就注意到了今年各项任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似乎大家都理解这一点。然而，今年的头几个月就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以致打乱了许多经济部门的步调。政治局也好，政府也好，不得不紧急采取措施，纠正局面。尽管形势逐渐趋于正常，可是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要知道年初发生的情况本来是可以预见到的和避免的。然而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对此负责的是苏联国家计委（尼·弗·塔雷津同志）和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列·阿·沃罗宁同志）。

但是，失误的不单单是这些机关。黑色冶金工业部（谢·瓦·科尔帕科夫同志）和化学工业部（尤·亚·别斯帕洛夫同志）没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这两个部的企业中中断根据合同供货的行为，打乱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首先是机器制造业部门的步调。

从五个月的情况看，畜牧和饲料生产机器制造部（列·伊·希特伦同志）没有完成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供应技术设备的计划。原因是该

部门许多企业的工作组织水平低，尤其是在产品质量方面。部门内形成的巨大潜力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

再以已改行新经营条件的轻工业为例。这个部门的领导借口客观困难，拒绝接受商业部门的许多订货并收缩了产品生产。要知道，提高产量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必须认真地停止滞销商品的生产，而代之以消费者期待的商品的生产，并且要有足够的数量。轻工业部和部长弗·格·克柳耶夫同志的立场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主管部门利益高于社会需求，也就是高于人民利益。对此不可能作出别的评价。

鉴于这一切，我想特别强调指出各中央管理机关对改革所负的责任。考虑到各项新任务，应当千方百计地提高这种责任。

例如，我们有一项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计划。这是一件大事。这里的工作开展得很有规模，目标是取得重大的最终结果。

但是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机床制造业、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和电机工业部、轻工业、食品工业机器和日用器械制造部的情况使我们感到不安。尽管这里也在作一定的努力，可是目前离仪表制造业发生转折尚远。

其他机器制造部的现代化任务也解决得缓慢。当然，我们理解，机器制造工作者遇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和困难。这里说的是根本改革整个机器制造系统的工作。可是费解的是，为什么许多部长、党的委员会和各部机关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办事，好象他们是在解决一般性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机器制造局（伊·斯·西拉耶夫同志）、国家计委和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及苏共中央一些部的工作明显缺乏积极性和进取精神。显然，机器制造系统的情况值得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研究。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远不是所有地方党的机关和地方苏维埃机关都已积极投入改革。例如亚美尼亚的改革就是在那里打空转。共和国的劳动者对这里业已形成的经济形势，尤其是思想道德领域的状况感到十分不安。同时，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首先是中央第一书记卡·谢·杰米尔强同志却认为共和国的形势十分好。不但如此，有人甚至硬说亚美尼亚还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之前就开始改革了。很难说这是什么意思。

该共和国里表现出一种毫无根据的安之若素的气氛，对于部没有提

出应有的严格要求，没有开展有效的工作同贪污、投机倒把、任人唯亲的现象作斗争。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应当深刻地分析一下党组织内和整个共和国内的实际情况，并从原则立场出发加以讨论，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上从事改革。

在象高尔基州这样一个大州的党组织里取得的显著进展也不多。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里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这个州的强大潜力没有适当地加以利用，社会领域和经济的农业部分发展不力。应当认为，州的党委员会（尤·尼·赫里斯托拉德诺夫同志）、州的各级党组织会从批评中得出结论并改变局面。

苏共中央各部在新形势下也应当用新的态度办事，以便对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实际状况产生更深刻的影响，保证监督苏共中央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

同志们，党和社会明确地认识到，改革是长期的政策，使苏联社会达到新目标的任务是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的。然而在事实上，某些同志对这个正确和现实主义的观点是这样理解的：似乎改革同我们旨在加速的总的战略方针并不相关，可以不慌不忙地、不必多操心、而且无须多大麻烦就可以实现。这是极大的误解，起码从两个原因来看是如此。

其一，我们本来就已经损失若干年和若干个十年的时间了；其二，如果今天不汗流满面地工作，不改变思维方式，不克服惰性，不采用新的方法，那么，“美好的明天”就可能实现不了。“改革可以等一等”的论调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政治局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在今天，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每个人在自己的活动领域，就应当取得显而易见的实际成果。

苏联人明白，要达到改革的许多目标，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他们正确地提出问题：为什么今天不去解决那些会大大改善劳动、生活和日常条件的，会使道义精神气氛健康化的刻不容缓而又比较容易的任务呢？

某些地方不仅没有前进，反而退出了原先已经占领的阵地，这一情况也没有逃过我们的人的注意。以争取纪律和秩序的斗争为例。要知道这是事实：许多地方热情下降，工作极端疲沓。酗酒现象又频频发生，游手好闲者、不劳而获者和顺手牵羊者，即靠他人为生的人，又觉得自由自在。劳动人民对此感到担心。同志们，这种担心是有理由

的。

重大的非常事件周期性地反复发生，这说明纪律松懈，缺乏必要的秩序。原因往往是同样的：不守纪律，玩忽职守，经营不善，不负责任。一架西德的体育运动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并在莫斯科着陆，正说明了这一点。不论从哪个观点看，这个事件都是没有先例的。它再次提醒人们：党的四月中央全会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揭露的不良现象，在我们社会中，甚至在军队内，是多么严重和顽固。这强调表明，必须提高警惕性，更加坚决地行动，处处加强纪律，在各级加强组织性、责任感和勤奋精神。

我以政治局和国防会议的名义坚定地声明，无论是党内还是人民中，对苏联武装力量保卫祖国的能力不应当有怀疑。

同志们，当我们谈到首要任务，谈到刻不容缓的工作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首先一定要消除有目共睹的、普遍存在的缺点，在商业、服务业、保健和公共事业中，即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那些经济环节中，将更有秩序。

当然，这些问题应当在政府一级处于注意的中心，但是，对各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专区、市和区的政权机关的工作状况，需要提高要求。遗憾的是，现在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改革的好处讲得多，对切实满足人们最普通的需求的工作做得少。许多地方工作人员的依赖心理根深蒂固。有些地方，只要作出不大的努力，稍加注意一下，便足以解决问题，但即使在那些地方，还继续往中央推，等上面帮助。这种态度是极不合适的，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并加以克服。正是在这些地方，需要党的关心，党的要求和监督！而这种关心、要求和监督显然不够。

在今天的全会上，在头等重要的任务中，我想特别突出保证我国人民食品、住房、消费品和服务这项任务。

应当指出，这方面已经既有具体的经验，又有具体的成果。

以**食品问题**为例。这方面的情况在改善。有关的数字基本上已经知道。我只举几个能说明近两年来变化的数字。粮食产量同1984年相比增加了3700万吨，肉类（屠宰量）增加了100万吨，奶类增加了430万吨，蛋类增加了42亿个。

我们可以说说农村经济生活的活跃。这一点之所以有可能，是由于

经济条件、经营方法的变化，首先是由于推行了完全经济核算制、集体承包制和家庭承包制。

政治局认为，现阶段已经具备一切客观条件，在增产农产品方面实现某种，我要说是，突破。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有取得根本进展的可能。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应当特别注意哪一点呢？首先是掌握耕作业和畜牧业产品生产的集约化工艺，更广泛地推行集体和家庭承包制，更积极地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同志们，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要坚决制止那些继续干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对此又不承担物质责任的人。不久前在苏共中央举行的会议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领导人所要求的，恰恰是不要对农庄农场的活动进行这种不合法的干预。我们的责任是帮助农村劳动者呼吁那些无法放弃老的工作方法的人守规矩。

由于改变了对联盟—共和国提供产品的计划工作制度，今天，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区对增产农产品的兴趣无比地提高了。但是与此同时，它们对保证食品供应的责任也提高了。应当指出，这有力地推动了地方上的主动精神。凡是迅速而切实地理解了变革的意义，并对已经开辟的可能性作出估价的地方，都已经取得不坏的结果。例如，根据上半年的结果，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顺利完成了向联盟—共和国提供畜产品的任务。此外，他们还为自身需要采购了1.5万吨肉（这相当于市场基本供应量的35%以上）、10万多吨奶和6500万个蛋。

再以鞑靼自治共和国为例。这里除了基本供应量外，为满足当地的需要又增加了1.5万吨肉和5.9万吨奶。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和切尔诺夫策州的情况也类似。这4个州增加的肉供应量近2万吨。白俄罗斯各州多获得了2.5万吨肉和26万吨奶用以改善当地供应。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库尔干州、奥伦堡州、萨拉托夫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和其他某些州的情况也是如此。

应该千方百计地支持州、边疆区和共和国各级组织为依靠增加公有经济部门农产品的产量超越五年计划的计划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保证无条件地完成对国家储备的供货和大大改进对地方居民的供应而作出的努力。这是主要的方针。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该提高最近几年用于农村

发展的投资的产值率。

但是，应该利用所有潜力。应该再来谈谈个人副业的作用问题。各地对其作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待利用个人副业的潜力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鄂木斯克州个人副业的肉类产量在最近10年中从2.7万吨增加到6万吨，即增长了1.2倍。在这里几乎每一个在农村居住的家庭都在从事养牛、养猪和养禽业。正全面帮助居民获得幼畜、幼禽和饲料，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去年合作社从居民那儿购买了2万吨肉。在州内的市场上新鲜肉类的价格不超过每公斤3.5卢布。

再举另一类例子。弗拉基米尔州拥有巨大的工业和农业潜力。然而，去年该州总共只生产了人均46公斤肉（屠宰重），结果这里出售的肉产品有1/5是从我国其他地区运来的。在这样一些大型农业州，如文尼察州、基洛夫格勒州、尼古拉耶夫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奶类和肉类产品的供应也不很好。

在发挥地方主动精神的基础上不仅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产量，而且可以为发展食品工业做很多事情。譬如说，为什么在拥有极其丰富的原料资源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有25%至50%的糖果点心制品要从其他共和国运来？哈萨克共和国依靠地方生产供应居民的蔬菜水果罐头总共只有30%，而所有其余部分要从外地运来，这怎么能行呢？

同志们！必须在最近两三年内满足居民对果菜园的需要。现在不要再借口土地不足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土地是有的。即使是在那些空闲土地确实很少的地方，也应该从属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企业的土地中划分出一部分。让我们彻底商定：应该完全满足劳动人民的全部需要，取消在这方面的毫无根据的限制和障碍。

我想，应该尽快解决我国许多农业区，尤其是非黑土地带多年来，有时是几十年来空闲的房屋和宅旁园地的利用问题。现在废弃的房屋已达到将近80万幢。在这些房屋的周围还有荒废的土地。

人们不理解对待土地和对待建筑物的这种态度。他们在给中央和其他组织的请求信中要求允许获得这些房屋和使用土地。我认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把带有宅旁园地的房屋租给愿意要的公民，那将是正确的。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按合同原则这样做，以便使这些土地用于生产

农产品。

农业原料的运输、储藏和加工状况也可以说明在解决食品问题方面调度失当的例证。党的二十七次强调指出，消除这种状况的损失将可以使消费资源增加20%至30%，节约大量的资金。看来，这是四年级学生都能做的算术。

然而在1986年，苏联国家农工委、苏联渔业部和苏联谷物产品部尚未利用的用于发展加工部门的资金有4.5亿卢布。

同志们，请认真考虑一下大多数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都未完成这些部门的建设计划这样一个事实。你们看，这就明显地证明，我们是如何对待解决切身重大问题的。原来，我们一面努力制造产品，我们一面又继续将其损坏，因为这方面的仓库既不够用，加工企业的生产能力又不足，然后我们要靠进口来弥补损失。冷静地看看这些事情就足够了。苏联国家农工委应当同地方机关一道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哪些地方还需要进行起码的整顿，而主要的是，采取坚决的方针来尽快地和切实可靠地解决储存和加工问题。

我要说，上述一切都值得十分认真的考虑。近几年来，我们这里在解决粮食问题方面的依赖心理大大滋长了。许多地区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很轻率。饲料不足，他们就电告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农产品货源不足，也打电报给中央。

当然，我不同意把一切描绘成一种颜色，也不同意把问题简单化。许多的不幸都是同国内的总情况有关的，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的许多干部依然有依赖心理。

同志们，总的说来，政治局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具有现实可能性在最近两、三年内使食品供应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生活提供了惊人的例证，证明处处都具有巨大的潜力。许多事实说明有可能在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方面向前突破。不太久前成立的集约化劳动集体就证明了这一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长时期固定给这些集体。去年它们达到谷物人均700——800吨，而总产值为7万——10万卢布或者更多些。

遗憾的是，这样的集体尚少。家庭承包制推广得还不够广泛，尽管这种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的形式效力相当高。

当然，为了迅速扩大产品生产，既需要质量好的技术设备，也需要